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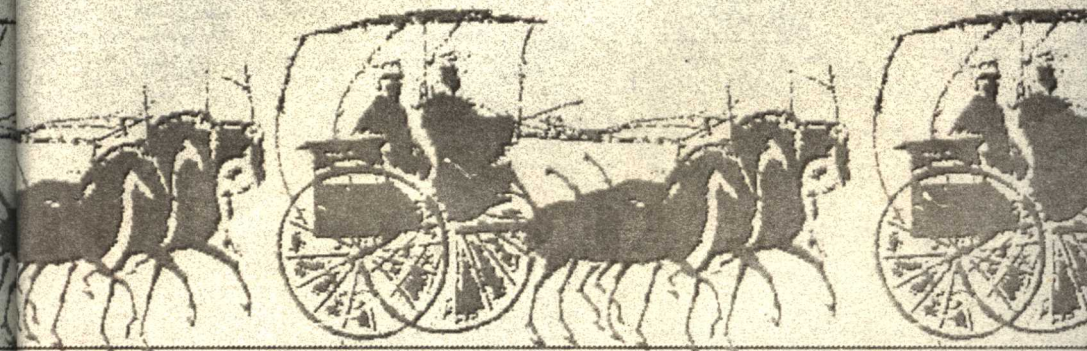
博学工作室

史记

〔西汉〕司马迁／著

崔凡芝／选注

山西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崔凡芝选注.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5. 2(重印)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史学名著卷)

ISBN 7-80598-616-9

I. 史... II. 崔... III. 中国-古代史-纪传体-通俗读物

IV. K204.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2865 号

史 记

著 者:[西汉]司马迁

选 注 者:崔凡芝

责任编辑:落馥香

出 版 者: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20(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E-mail: Fxzx@sxskcb.com(发行中心)

Wed@sxskcb.com(信息室)

guishb@sxskcb.com(综合办)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运城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11.125

字 数:280 千字

印 数:5001—10000 册

版 次: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12.00 元



前 言

有学者说,不研究《史记》,就不知中国文化从何谈起。可见,《史记》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书,是提高国人文化素质的必读之物。

《史记》博大精深,可谓百科全书,而其在史学与文学上的贡献尤为卓著,故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认识《史记》在我国史学发展中的地位,首先应对我国史书形成的历史作一简单追述。

春秋后期,孔子整理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后世称为《六经》,是古代文化的集大成。从广义看,“六经皆史”,都是古代先王治国的典籍,对研究古代社会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从狭义看,其中《尚书》汇编了上古三代的历史文献,《春秋》记载了春秋一代 242 年的史实,二者可视为我国最早的一部通史的上下篇。因此,孔子被称为文化圣人,史学鼻祖。

司马迁十分景仰孔子,曾深情地表述了赞美与向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战国以来,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孔子整理过的古代典籍已经淆乱,新增诸家文集未能整理,而战国直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事实亦未作条贯,历史呼唤新的“孔子”出现。

司马迁父子自觉地承担了传承文化、编著史书的历史重任,决心继孔子之《春秋》而撰著《史记》。可惜父亲司马谈早卒,故这一历史重任自然落在了司马迁的身上。

司马迁生于公元前 145 年,祖籍今陕西省韩城县。10 岁诵古文,20 岁壮游山河,作社会调查,34 岁出使西南夷,35 岁父卒,38 岁作太史令,42 岁开始写书,47 岁因李陵案受宫刑,54 岁写完《史记》,58 岁



去世。准备30多年,写作12个春秋,才完成了这部集古今文化大成,贯中华3000年历史的巨著。后世仿效其体例与实录精神,发展成系列国史,史称正史,司马迁亦被称作史圣。因与孔子所处区域方位不同,二人又被称作东圣、西圣,在文化传承、史学贡献上,为后人相提并论。

具体讲司马迁在史学上的创新,可从体例创新与思想创新两方面认识。先看体例创新。

《春秋》是以时间领起史事的编年体例,属于大事记一类的记事,不易对细节、人物作详细描述。司马迁以编年体为基础,创新记事方式,突出人物记载,成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相配而成的纪传体例,大大扩展了记载的范围。如本纪以记载政权、帝王和曾号令过天下的人物为对象,多记重大事件,为全书大纲;十表配合本纪罗列细事;八书写典章制度、文化习俗;世家写诸侯、将相的世袭传承;列传叙“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的杰出人物。总体以人物传记为主,突出明主、贤君、忠臣、侠义之士的功业,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编纂思想。所写人物大体分作帝王类、诸侯类、一般人中的杰出者,形象地呼应了封建政体中的等级秩序,囊括了封建社会中各色人等所从事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活动,并注意揭示出各种事物之间的彼此联系及内在规律,所以为后代王朝颁令作国史体例。随时代演进而成26史。这是一套完备、准确、独具权威的系列史书,首开先河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当然功不可没。

再看思想创新。

司马迁在传承古代文化中,审视了前贤的思想,吸纳了诸子百家的认识,在历史观、天道观、民族观、经济思想、人生观各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当时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对后世有积极深刻的影响。下边试作分析。

一、历史观

司马迁著史的宗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通古今之变”就是要对古今变化的历史做一次考察,探



求变化的原因。其“通”，包括时间上的纵通和空间上的横通两方面。其叙 3000 年历史是纵通，囊括各阶层诸方面活动为横通。其“变”则旨在通过“原始察终”的考稽，探索“成败兴坏”的原因。

五体配合展示着横通的范围，是司马迁选用纪传体例表达通变观念的外在形式。而更能体现其通变观念的则是在纵通 3000 年中的历史分期思想。司马迁视历史为一条流淌不息的长河，长河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阶段间以大事件作标志，而形成阶段变化的主要原因则是道德力量和政治改革的作用。

关于历史分期，孔子有过大同、小康的划分，韩非有过上古、中古、近古的说法，等等，都太笼统，没有具体化。司马迁则通过本纪、表的形式，划分了五帝、三代、春秋、战国、秦、秦楚之际和入汉以来几大阶段。按现今公认的历史分期来看，五帝之时，属于传说时代的原始社会后期。夏、商、西周三代是国家形成，进入文明时代的奴隶制社会时期。春秋即十二诸侯时期，有五霸称雄；战国即六国时期，有七雄征伐。春秋战国是以武力征战夺取天下的暴烈时代，正处于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时代，秦统一天下是这一转化完成的标志，而秦楚之际则是转化的余波。入汉后的升平，则意味着封建大一统走上了巩固阶段。

司马迁虽作了分期，但对当时的社会性质不会有如此清晰的认识，难得的是他对每一阶段的特点作了提示。他认为“禅让”是五帝称誉后世的美德，积德累善是夏、商、西周三代长治久安的原因，幽、厉失道是西周政权衰落的开始，而五霸、七雄实为暴力征伐时代的产物。秦国上百年的政治改革造成必胜之势，“法后王”是成功的秘诀。其对“禅让”、积德累善给以赞扬，对失道、暴力征伐给以批评，对秦的“法后王”则是从政治改革的角度予以肯定。就此可看出，司马迁是从关注道德力量和社会改革的角度来考察历史通变原因的，这是他高度重视人为作用的必然思路，是一种对历史发展动力的思考。

司马迁重视人为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人才与人心的关注上。在《刘



敬叔孙通列传赞》中说：“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强调了富有智慧的人才是政权成功的保障。故在叙述秦取天下的过程中，描述了大量各色各样的人才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商鞅、张仪、魏冉、白起、范雎、吕不韦、李斯等在司马迁的笔下，都为秦的成功立了汗马功劳。司马迁为战国人物共立列传 21 篇，秦就占去 9 篇，并在《李斯列传中》将其长达近千字的《谏逐客书》全文录入，说明人才与政权成败的关系。“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楚元王世家赞》）“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赞》）司马迁认为人才中最最重要的是将相之才。同时，还认为人为作用又表现在人心的归向上，他赞成“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道理，并把这个认识贯穿在许多人物传记中，尤其是对项羽和刘邦成败的总结上。项羽暴虐，反秦过程中，一路屠杀，大失人心；刘邦宽厚，一路安抚民众，得百姓拥戴，最终取得天下。《史记》全书提示了统治者要重民、恤民、爱民以及教民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其关注人为作用，以民为本的历史观的体现。

二、天道观

“究天人之际”，指天与人的关系。这是个古老的命题，每个思想家都必须做出解释，司马迁自不例外。实际上，在“通古今之变”中，司马迁对人为作用的强调，从实质上已回答了这一问题，只是没有具体化而已。对天命鬼神的认识反映了人类抗争环境的历程。殷人凡事作占卜，认为天命鬼神主宰人世。周人虽未否定天命鬼神，但已注意到人为的作用，把二者的关系说成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相信“天道酬勤”，“唯德是辅”。春秋战国以来许多思想家对此已提出质疑，荀子甚至提出“人定胜天”的命题。司马迁吸收诸子的进步思想，对传统的天命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的辩驳。在《伯夷列传》中，他反驳了所谓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认为伯夷、叔齐“积仁洁行”却饿死，颜渊好学却“糟糠不厌，而卒早夭”，这是天道佑善吗？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



横行天下，竟以寿终”，这是天道惩恶吗？他不解地说：“余甚惑焉，悦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而对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的自辩，司马迁历数其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尚不觉悟而不自责等等，却归罪于“天亡我”，实在是一种荒谬之说！蒙恬被赐死，认为是修长城破坏地脉所致，司马迁批评其轻百姓力，不抚恤振济伤病之民，却阿意兴功，兄弟遇诛是罪有应得，与取罪地脉有何相干呢！

就此看，司马迁是强调人为力量而不相信天命主宰的。但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他不可能彻底地抛弃天命思想，其理性的光芒还没有完全照进天命的王国，局部的理性判断和整体的非理性的传统观念，还极不协调地掺和在一起，尤其在天人感应的问题上，还保留了许多神秘色彩，如通过望气、相面、斩白蛇等现象说明刘邦得天下有皇权神授的成分在。彗星出现意味着战乱，五星联珠是祥瑞之象，等等。这些神秘色彩是当时人们有限的智慧还难以完全正确解释的，再加上新生的地主阶级政权又需要为其合理性加以文饰。要求司马迁完全摆脱这种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是不现实的。而《史记》通篇以人物为中心，在建立政权中突出人为的决定作用，在具体人物的成败中批驳了天命观的荒谬，也就足以证明司马迁的天道观已有了相当的科学性和历史的进步意义了。

三、民族观

传统的“夷夏之辨”，反映了中原政权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歧视。司马迁则为匈奴、东越、南越、朝鲜、西南夷立了列传，详细记叙了他们所处地域、经济文化、风俗习惯、与汉族交往、通婚、战争、迁徙、归附等情况，首创民族史传，使与其他传记平等并列，没有贬斥和歧视。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反映了历史上的民族隔阂。司马迁则用血统论将各民族均视为黄帝的后裔，是一脉相承的兄弟关系。虽然未必科学，但增强了各族之间的凝聚力，极有利于促进我国多民族一体国家的形成。至今全世界华人的宗亲情结依然浓重，司马迁



奠定的民族亲情关系影响可谓深远。

从民族团结的角度,司马迁表彰了推行睦邻政策的人物。魏绛和戎属于汉化,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属于胡化,中华民族便是在相互融合中友好发展的,司马迁对这一类关系的揭示,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各政权对民族与邻国关系的处理,友好相处成为信条。

四、经济思想

《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司马迁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创立的经济史专篇。针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汉武帝与民争利的新经济政策,他主要谈了以下两方面。

第一,批判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业活动的压制,提出要想富国富民,必须农工虞商四业并举。而四业中,“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就个人经商而言,精熟职业的“诚一”精神是取富的正道,“奇胜”是致富的诀窍。对当时汉武帝过多干预商业活动、与民争利的商业政策给以批评与揭露,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工商业政策思想。这是十分大胆而又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第二,以“稽其成败兴坏”的史家思维,为30多位商人立传,总结他们经商致富的各种经验,诸如商品保护、货物运输、价格规律、气候时令、突发机遇等等,都与商机密切相关。好的商人应是第一流的人才,他们应该具有伊尹、吕尚一样的治国谋略,孙子、吴起一样的用兵将才,商鞅变法的决断等等。没有这样的智慧、刚强、勇敢,是不会在商海中拼搏成功的。而拥有了雄厚物质财富的商人可以与王者同乐,美其名为“素封”。

司马迁所讲经商之道的语言是十分精辟的,如“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趋时若鸷鸟之发”,“贫富之道,莫之予夺,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凑,不肖者互解”,“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等等,至今仍有活力。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由于与主流思想不相符合,故一直受冷落。直至近现代西方商业的理论传入中国,一些学者才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梁启超认识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前哲精意,千年湮没,致可悼也”(《史记货殖列传今义》)。就此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对现在和今后的商品经济发展,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上,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人生观

司马迁以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为座右铭,立志著书传承文化,但李陵案的发生,使他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更加冷静地进行了人生价值的定位考虑。在《报任安书》中,他向朋友作了倾诉:“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他历数西伯文王演《周易》,孔子著《春秋》,屈原赋《离骚》,左丘写《国语》等等,都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思垂空文以自见”。经过衡量比较,他终于接受了耻辱的腐刑,忍受着最大的精神痛苦,终于完成了著史的伟大事业。他形容当时的精神状态是“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司马迁以自己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和卓绝的奋斗精神,为后人树立了一种为事业而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的积极的人生形象,而他笔下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多为“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有为之士,弘扬着一种健康向上的人生哲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正因为司马迁著史中,为后人提供了以上各种科学进步的创新思想,故使《史记》成为培养一代又一代人才的精神食粮,因而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



二

关于《史记》在文学方面的贡献,可作辩证认识。历史贵纪实,文学重创作,二者有很大差别。但又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即史学纪实也要借助文学传神,文学创作也要以史实为依据。只有二者巧妙结合,才会有好的作品出现。《史记》就是融文史于一炉的精品。司马迁借用了许多文学手段来叙述史事,描写情节,塑造富有个性特点的人物形象。我们仅从以下三方面作一简单分析,即可概见全貌。

第一,善序事理。

《史记》最初传布于世,便受到大学问家刘向、扬雄的关注,“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汉书·司马迁传》)。班固之父班彪亦称司马迁“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后汉书·班彪列传》)。

所谓“善序事理”,也就是指在叙事中能将其内在联系中的事理揭示出来,有着立意和章法的巧妙结合,故谓之“善”。《史记》所记人物多达4000多个,给人印象较深的约100多人,而司马迁刻意描写的多为大篇,最为精采的有《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等。从项羽、刘邦的成败中,可以揭示出许多发人深省的事理,仅以项羽为例,司马迁主要抓住三件事表现其成功与失败,即钜鹿之战是斗力,他胜了;鸿门宴是斗智,他处下风;垓下之围写其英雄末路,死不觉悟。三段都写得精采,不只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而且何以成其英雄,缘何处于下风,失人心而致败等等事理也使读者了然在胸。行文雄放流宕,以三个“无不”、三个“莫敢”活画了项羽的威猛气概;以喜爱武士的率直憨态而错失了置对手于死地的良机;以悲歌慷慨、临终不悟而渲染其末路英雄的悲哀。行文雄健,语言生动,真可谓善序事理的大手笔。

善序事理的又一手法是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在叙事中,借助他人



评论,或以己意作评,会起画龙点睛的作用。如在《平准书》中,对桑弘羊为汉武帝推行的兴利害民政策,是借卜式之语加以评点的:“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讲到酷吏张汤的不得人心处,则是在叙事中用“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这些评点,都给人以理性的思考,深化了读者对事物的认识,而其篇后的“太史公曰”,又往往是对寓论断于叙事的总结与揭示,使通篇叙事中的事理更加明确和深化,是史学、文学、思想三方面的有机结合。《史记》的文章,被称为古代散文的典范,为唐宋八大家推行古文运动的样板,正是其“善序事理”符合了“文以载道”的总体精神而被推崇的。

第二,戏剧性与悲剧情怀

司马迁在叙事中,往往选取紧张的场面、激烈的矛盾加以详细描述,使故事的情节极富戏剧性,极具吸引力。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项羽本纪》中的钜鹿救赵、鸿门宴、霸王别姬,《赵世家》中的搜孤救孤,《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刺秦王等等,其情节或剑拔弩张,惊心动魄,或一波三折,妙趣横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许多情节已被前人编写成戏曲剧目,流传后世,家喻户晓。即使现代社会,也仍有人以《史记》为题材加以创作,如《屈原》、《棠棣之花》、《胆剑篇》、《大风歌》等剧目,以其浓郁的戏剧情节感奋着世人。

也许是由于自身的坎坷经历,司马迁更钟情于写悲剧人物。《史记》全书130篇中,人物传记占112篇,其中57篇以悲剧人物的姓字标题,此外,近20篇虽不标题但写了悲剧人物。所写大大小小悲剧人物多达120余个。如项羽、韩信、黥布、廉颇、李牧、李陵、屈原、贾谊、商鞅、白起等等,他们都能扶义倜傥,立功名于天下,但均以悲剧的结局告终。正如鲁迅所说“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一样,司马迁用如椽的大笔书写他们有价值的业绩,以充满理解和同情的笔触刻画悲剧结局和传述他们痛苦的心声,故有学者说《史记》是一道悲剧人物的画廊,是一部悲剧故事集。但司马迁写悲剧,并不仅仅停留在悲天悯人的痛苦中,而是通过对一个个人



生忧患的深切体验,达到对人类普遍命运的体认,更坚定对美与善的理想追求。因此,他为正义呐喊,为侠士讴歌,为失败的英雄流泪,为不屈不挠的人们助威。表彰与命运抗争的人生,用悲情激发出更顽强的生命力。正是这种积极向上的情怀,使得《史记》的悲剧情节,更具有了生命的灿烂和悲壮的美丽。

第三,个性化语言

司马迁写谁像谁,最重要的是运用了个性化的语言。项羽叱咤风云,刘邦豁达大度,吕后刚毅嫉妒,樊哙勇猛粗犷,蔺相如智勇,廉颇忠诚,等等。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正是用个性化的语言点化出了独有的性格和风貌。项羽看到秦始皇便说“彼可取而代之”,一副骄悍不屑的表情,刘邦看到则曰“嗟夫,大丈夫当如此也”,是一种羡慕向往的神态。就中见出项羽粗犷悍戾,而刘邦则对事业的成功有着谨慎的憧憬。天子为霍去病治第(建公馆),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一句豪言,吐尽英雄壮志,可以想见其为国献身的大将风范。吕不韦见子楚而说“此奇货可居”,绝对是商人的语言,故其在秦国的主政中必然是唯利是图的政客。陈涉乡人见到旧日伙伴居住在殿屋帷帐中时,惊奇地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沉沉”均为方言土语,出自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农村人之口,十分传神,天真淳朴与亲密无间的情谊跃然纸上。

综合以上三方面,擅长阐明事理的叙事,波澜起伏的戏剧情节和充满全书的悲剧情怀,以及描摹各种人物的声色口吻而形成的个性化语言特色,是使《史记》在文学上极富艺术魅力的主要原因所在。

三

对《史记》的学习与研究,历来为学者所重视。汉唐时期已形成“史记学”,宋、元、明清至近现代是研究的发展时期,建国以来是深入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队伍扩大,成果递增,各院校开设



《史记》课程,招收《史记》研究生、博士生,建立研究室,成立研究会,《史记》研究进入了黄金时代。

研究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从传统微观的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以及编纂体例等的研究,发展为宏观的思想理论研究,即对历史观、天道观、民族观、经济思想、人生观等方面加以探讨。又与其他文化相联系,如与文学、经学、新闻、农业、建筑、天文以及各区域文化等作相关研究。最近有学者将对其内涵研究拓展到对其外延的研究,如从接受史的层面,即审美角度来探讨读者的价值取向。每个人或者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选择定位标准。对项羽乌江自刎一事,宋代李清照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说明处于离难中的李清照对末路英雄的苦心孤诣是理解和接受的。但晚唐诗人杜牧却认为:“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显然不以选择死亡为上策,与杜牧明朗豪放的性格不无关系。

即此,《史记》研究的深入性已可见一斑。

《史记》在朝鲜、日本流传已达 1500 年之久,现代日本研究者多达 200 多人,著作达 680 多种,其中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是继我国三家注后最大的一次整理。其他欧美各国亦有众多的《史记》爱好者与研究者。说明《史记》已成为国际上的经典名著,其广泛性亦可见一斑。

声势浩大的研究热潮正在国内展开,协作攻关是动向之一,《史记研究集成》、《史记会校、会注、会评》、《史记系列大辞典》、《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等字数高达几百万、几千万字的大部头正在编纂出版中,各种类型的研讨会频频召开,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老中青队伍的形成是协作攻关的强有力支柱。

普及性工作的开展是《史记》研究热潮的动向之二。我国古代凡有建树的学者,都从小熟读《史记》,从中汲取了传统文化的营养,认识了古代先人的原貌。所以说,《史记》是中国人民的思想源



泉之一。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用不同方式出版推出的少儿、青少年、中老年喜爱的《史记》读物，都有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都会有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现今我国各大出版社及地方出版社应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正积极地进行各种形式的《史记》读物的出版工作，这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需要。

四

本书选注《史记》16篇，篇幅过长的略作摘录。选注的原则有二。第一，注意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兼备，以展现原著体例编著的原貌。其中列传在原书中所占比例就大，反映社会面最广，最能反映作者对全社会的关注，故本书所选列传的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二，是符合原著编排意图的。另外，为了帮助读者对《史记》及作者司马迁的了解，附录中收入注释了《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安书》一文，并收入“《史记》所记大事记”、“《史记》名言警句”（在正文中用着重号标出）、“《史记》版本概况”和“20世纪以来《史记》研究论著参考书目”，读者可通过此了解有关《史记》更多的资料。

第二，注释力求做到雅俗共赏。有关古代典章制度的常识，为便于读者理解古代社会，故多所阐释。对难懂字句，作白话疏通，为不使文意中断，注释号置于句末。

本书所引《史记》正文，用中华书局1959年版的标点本做底本，以简化字排版。对原文中的古今字、通假字等按通行字作统一处理。对部分保留字体，在注释中做出说明。在段落划分及断句方面亦略有改动。成书过程中，田如意同志参与了若干注释与校对工作。注释中的错误与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山西大学历史系 崔凡芝

2003. 11. 15



太史公自序(节选)^①

【原文】

昔在颛顼^②，命南正重以司天^③，北正黎以司地^④。唐虞之际^⑤，绍重黎之后^⑥，使复典之^⑦，至于夏商^⑧，故重黎氏世序天地^⑨。其在周^⑩，程伯休甫其后也^⑪。当周宣王时^⑫，失其守而为司马氏^⑬。司马氏世典周史^⑭。惠襄之间^⑮，司马氏去周适晋^⑯。晋中军随会奔秦^⑰，而司马氏入少梁^⑱。

【注释】

①太史公自序：《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故称《太史公自序》。自序概述了司马氏世系、家学渊源、《史记》成书经过、著述动机和全书宗旨，内容丰富，学术价值很高。这篇自传体序言与《报任安书》是研究司马迁生平及创作思想的主要资料。本篇主要是自述家世、游历、学术渊源、创作宗旨、人生定位及写出130篇的序目提要。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接受了父亲兼收并蓄的学术思维方式和著史委托，受到儒家礼义思想的教化和名山大川的熏陶，决心继孔子之《春秋》而撰写《史记》，著史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本篇略去了130篇的序目提要部分。

②颛顼(zhuān xū)：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号高阳氏，生于若水，居于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南)，按《史记·五帝本纪》的传承关系，其时代在黄帝之后，是黄帝的孙子。

③南正重：职掌天文的官员名字叫重。南正，上古官名，属天官，职掌天文，观星象，定历法。

④北正黎：职掌农事的官员名字叫黎。北正，上古官名，属地官，掌地理，负责农事。

⑤唐虞之际：尧舜之时。唐，即陶唐氏，传说中远古部落，居于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尧是其首领。今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经学者认定为尧时遗存，至今约4500~3900年。虞，即有虞氏，传说中远古部落，居于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市西蒲州镇)，舜是其首领。

⑥绍：继续，接续。重黎：上文以重、黎为二人，此以重黎为一。《史记·楚世



家》云：“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对此，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卷26解释，黎之后以地官兼天官，故号重黎氏。

⑦复典之：继续负责观测管理天地的工作。典，主管。

⑧夏商：夏朝和商朝。夏，即夏后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相传是大禹之子启所建立，建都阳城、斟鄩(xūn，皆在今河南省登封县附近)、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等地。共传13代16王，约当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商汤伐夏桀以后建立，建都亳(bó，今山东省曹县南)，曾多次迁徙。至盘庚时迁都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故商又称殷。共传17代31王，约当公元前16世纪到前11世纪。

⑨世序天地：世代职掌天文地理。序，以次排列。此处作职掌讲。

⑩周：朝代名，武王伐纣后建立。分西周、东周。西周定都于镐(hào，今陕西省西安市以西沔河以东)。东周分春秋、战国两段。定都于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西、东周共历34王，800多年。约当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256年。

⑪程伯休甫：程，古国名，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伯，周封诸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之第三等。休甫，人名。程伯休甫系重黎氏的后裔。

⑫周宣王：姬静，西周第11世国君，在位46年。

⑬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失去了世序天地的职守而以司马官职为氏。据文献记载，程伯休甫是一位著名的将军，在周宣王平定徐方的战争中立有战功，故以官职赐氏姓，为司马氏。

⑭司马氏世典周史：司马氏一族，世袭了周代的史官职守。

⑮惠襄之间：周惠王姬阍(láng，前676年至前652年在位)和周襄王姬郑(前651年至前619年在位)之时。这两位国君在位期间均有王室内乱出现，惠王时为子颓作乱，襄王时为叔带作乱。说明周王室政局不稳，故有下文司马氏的离去。

⑯去周适晋：离开周到了晋国。晋，周武王时封其少子叔虞于夏墟古唐国地，后叔虞子燹父因封国在晋水边而改国号为晋，初封地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与曲沃县之间的天马一曲村之间。后为春秋五霸之一。

⑰晋中军随会奔秦：晋国的中军官随会因内乱逃跑到秦国。随会，即士会，又称随武子、范武子、范会、士季、随季等。春秋时晋国大夫。公元前621年，晋襄公死，随会入秦国迎立公子雍。赵盾立襄公子夷皋，是为晋灵公，并发兵抗拒公子雍。随会留秦避难。后来晋国安定后，随会回到晋国做了中军统率，这里称其为“中军”，是史家追书。秦，周平王所封诸侯国，嬴姓，始封君主为秦襄公。定都雍(今陕西省凤翔县东南)，辖今陕西省中部、甘肃省东南端。穆公时称霸，为七雄之一。秦王政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